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八七期 ——
(二〇〇六年三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3c)

【回首文革】	军报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始末	宋 维
【史海钩沉】	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王效挺·黄文一
【历史一页】	东湖风云录(之十一)	徐海亮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军报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始末

• 宋 维 •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一篇“火药味”很浓的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了文艺界、史学界、新闻界的关注。军报编辑部的老总和编辑们，凭着新闻敏感，也都不约而同关注地这篇文章。

我当时在军报的文化工作宣传处当编辑，根据宣传任务的需要，文化处的编辑经常要跑剧院、影院看戏看电影。《海瑞罢官》这出戏早在1961年就上演了，因为当时没有宣传任务，所以没去看过。老实讲，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我也不是非常熟悉。记得是1959年4月间，听了上海会议（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才首次听到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讲到了海瑞。他针对伴随1958年“大跃进”的浮夸风而出现的不敢讲真话的不良作风提出了批评。他直言不讳地承认：有很多假话是上面压下来的。由此他讲起了明朝忠臣海瑞的故事，说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连嘉靖皇帝也敢骂。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学习海瑞敢于直言的精神，并说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这样，报纸上也就陆续出现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一类的文章，舞台上也就出现了《海瑞上疏》、《海瑞罢官》一类的戏。事隔没几年，言犹在耳，遵照他老人家当年的讲话精神，新编的历史剧，怎么会一变而成为“大毒草”呢？

姚文元的文章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发生在明代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生拉硬扯地同1961年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什么这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进而宣判《海瑞罢官》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的“大毒草”，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感，受到了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他当时还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以陆定一为部长的中宣部的抵制，《解放军报》同首都各报一样，也都迟迟未予转载。康生当年主持编写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说：“11月11日至28日，北京各报刊，在18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当时人们对姚文元的文章虽然有很多看法，但充其量只不过把它看作是继1964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孙冶方的“经济挂帅”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以来的又一次大批判，谁也不了解姚文元文章乃是江青奉毛泽东之命，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炮制的，更没意识到发表姚文元文章乃是毛泽东的重要战略部署，是要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政治运动。

关于《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我曾同他有过一面之缘，他是一位史学专家，精通明史，当时任北京市的副市长。1962年9月，我曾同另外一位编辑到他家，约他为军报写一篇《论民族英雄》文章。初次接触，感到他文质彬彬，平易近人，一派学者风度。想不到因为批《海瑞罢官》，《论民族英雄》一文竟也受到了株连，批判文章说它是“直接射向军队的一枝毒箭”、“采取歪曲和伪造历史的手法，抬出几个忠于封建王朝的所谓‘民族英雄’，借尸招魂，以古喻今，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传”云云。不过这是到了批判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热火朝天之后的事了。

◇ 罗瑞卿打招呼：文章很重要，《解放军报》当尽快转载

1965年11月25日，也就是姚文元文章发表半个月之际，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陪同周恩来到达上海。这时上海的报纸正围绕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展开热烈的讨论。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悄悄告诉罗瑞卿，毛泽东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十分不满。毛泽东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毛泽东关照此事对谁也不要讲。陈丕显对罗瑞卿说：“我对谁也没有讲，但可以告诉你一下。”于是，罗瑞卿便要来一本刊登姚文元文章的小册子。罗瑞卿对毛泽东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一片赤诚。当他得知毛泽东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十分不满，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很快给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副主任刘志坚打电话，通报情况，说：文章很重要，《解放军报》应当尽快转载。其实，罗瑞卿那个时候的处境已经很不妙，林彪和叶群正在苏州秘密策划将他整倒。11月30日，也就是罗瑞卿到达上海的第五天，林彪派叶群持他的亲笔信和事先组织人写的几份诬陷材料，向毛泽东作了数小时的汇报。12月8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开始背对背地揭发罗瑞卿的所谓“问题”，而罗瑞卿此时却正在千里之外的云南视察边防部队。这是一次很不正常的会议，会议开始之前，常委中除毛泽东、林彪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罗瑞卿曾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表示过异议，这次会议之后不久，罗瑞卿就以“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要夺林彪的权”等毫无根据的罪名被打倒，成为“文革”初期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

◇ 两种观点不同的按语，反映了党内高层领导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

罗瑞卿给刘志坚打来的这个电话内容传到军报，军报的老总得知党的最高领袖发话了，理所当然地要紧跟了。这样，《解放军报》于11月29日率先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语，宣判《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编者按语说：

本报今天转载了《文汇报》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认真读一读。

1961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作者用歪曲历史真实和“借古讽今”的手法，极力美化统治阶级，宣扬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作者精心塑造了海瑞这个形象，要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去“学习”海瑞的所谓的“退田”、“平冤狱”以及所谓“刚直不阿”的“大丈夫”精神，等等，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阶级斗争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强调突出政治，就是要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一切事物。我们军队的同志，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用鼻子嗅一嗅，到底对哪一个阶级有利，对什么不利。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凡是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去干。反之，就坚决反对，坚决不干。

希望大家在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时候，好好想一想，议一议。大家要关心报纸刊物上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从中吸取教益。

周恩来得知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触怒了毛泽东，当然也不能等闲视之。在他的建议下，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会议，讨论转载姚文元文章事，有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参加。于是，《北京日报》于29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人民日报》于30日在《学术研究》版也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两家报纸都撰写了编者按语，和《解放军报》的按语不同的是，这两家报纸都强调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这两家报纸并不赞同姚文元的文章所采取的以势压人、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是这样写的：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扯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的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斗争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种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

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

两种观点不同的编者按语，首先在军报内部引起不同反应。有的认为军报的按语写得好，“旗帜鲜明，一针见血”，有的则赞扬《人民日报》的按语有水平。《文汇报》则迅即将三家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及配发的按语作为新闻编发了，而排列的次序则是把军报的按语放在首位。后来人们才得知，《北京日报》的按语是由邓拓、范瑾修改审定，并由彭真亲自定稿的。《人民日报》的按语是经周恩来最后定稿的。军报的老总当年主持起草这条编者按语，据我所知，并没有接受什么人的指令，只不过是毛泽东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十分生气这一信息中，断定毛泽东对姚文元的文章是肯定的，于是就按照姚文元的调子起草了按语。

30多年之后的今天，用今日的眼光，理智地审视批判《海瑞罢官》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不难看出，两种不同观点的按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党内高层领导在《海瑞罢官》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要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把吴晗纳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轨道，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另一种则是试图把已经开展的大批判加以约束，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加以区别，力求把运动置于学术范围之内，不赞成把它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解放军报》的按语用所谓“阶级斗争的观点”宣判《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显然符合前一种意图，适应前一种需要。所以当今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些著作，在写到这段史实、提到军报的这条按语时，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而且往往说：“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多年之后，当年主持军报工作的一位老领导，同《人民日报》当年的一位老总谈起此事，深有感触地说：“你们有后台啊！”

回顾这段历史，应当坦率地承认，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为特征的“左”的思想，在军报的宣传指导思想上那时已开始占居主导地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已成为自觉遵循的指导方针。不过回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上，我认为还要讲句公道话。军报在首都各报中带头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条调子最高的按语冒了尖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没有再发表自己的东西，而主要是转载《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文章，让部队广大读者关心和了解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后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加浓重的政治色彩，批判的调子也就越来越高。舞台上的海瑞形象，已不再是特定的历史人物，而是“穿了古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海瑞罢官》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同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有联系了，而是“配合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伺机再起，篡夺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在这种形势下，军报才开始陆续发表部队干部战士们“愤怒声讨”的大批判文章了，并且在批判的版面上，加上了醒目的通栏横标：“彻底粉碎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这时“左”的思潮已经恶性蔓延了。

□ 《百年潮》2003. 7

~~~~~

【史海钩沉】

## 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 王效挺 • 黄文一 •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认定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及其妻子曹轶欧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各种有关的书籍刊物也都是这样认定的。可是1999年7月，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上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却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哲学系少数教师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另一位先生在另一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总之，他们是以“自发论”来否定中央的定论。

凡是要否定一种说法，必先了解该说法的根据是什么，然后有根据地提出新的论据，这是一般的常识。印先生要否定关于“第一张大字报”的定论，但是，一不了解定论的根据，二不了解在审查康生期间，有关党员向党组织写的证明和汇报材料；仅仅根据20年后自己对部分人员的访谈，就匆忙地、草率地得出“自发论”的结论，来否定中央文件的定论。一些老校友对印先生的文章表示强烈不满，要求北大加以澄清。我们在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工作，理应接受此项任务。

2001年9月，我们在《北京大学校友通讯》（内部刊物）和《百年潮》上发表了《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根据中央审查康生时所留存的档案材料，对印先生等文章进行商榷。

我们文章发表后，印先生曾通过他的老师、王效挺的好友约王交谈。王把我们了解的材料都给印先生看了，而印先生却一个材料也未带给我们看，也未提出什么问题交谈，他把主要时间用在看我们的材料上。

最近，由于偶然的机，看到印先生刊登在《文史精华》去年（2004年）1月份的《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一文，看后感到：1.印先生仍然坚持“自发论”的观点；2.印文中对我们提供的材料，没有任何当事人对其本人曾写给本单位党组织的材料内容有直接的否认；3.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印先生对我们引证的多项材料，作了自己的“解读”，有些是断章取义、曲解原意，有的是假设前提，质询对方，甚至有奇特、荒唐的解读。因此，有必要对印先生的“再考订”一文进行再商榷。

### 一、假造前提，质问对方

印先生提出：1978年北大校刊上关于大字报的一篇文章强调的是“曹轶欧指使聂元梓”，而这次则说：“大字报的主谋为康生、曹轶欧，经过曹轶欧授意张恩慈串连杨克明等人写成。”印先生振振有词地质问：“为什么在关键性细节描述上作了调整呢？”为什么1978年“没有讲明当时已经掌握的从张恩慈到杨克明这个线索？”印先生说“听到一种解释是，当时为了在政治上保护聂元梓之外的其他大字报署名人”。又说，如果接受这种解释，这就不是“确切的历史事实，而只是经过善意取舍的故事”。这些质问，只要印先生动动脑子，稍加思考，排个时间表，自己就会作出回答的。

粉碎“四人帮”后，北大党委有关部门在清查工作中，发现发生在北大而影响全国的三件大事（北大社教、“第一张大字报”、“六一八”事件），都与康生有关。北大党委于1978年11月给党中央常委写了报告，要求在校内揭发批判康生（当时康生的反革命集团成员面目尚未被揭露）。12月初，中央常委批示：可以在北大揭发批判。

1978年12月19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的第二天），党委召开了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康生、聂元梓，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就以“某顾问”代表康生。聂元梓已是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党委决定在三个事件中涉及的其他干部和教师一律不提名。印先生听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其他同志”，是有此意。党委区分不同性质，“保护其他教师”有什么不对？印先生质问：“当时为什么不讲明已经掌握的张恩慈和杨克明的线索？”这是假造前提来质问。第一，当时并没有完全掌握张、杨的具体情况，刘仰峤、白处长等人的材料都是1979年写的，印先生根据什么说当时都“已经掌握”？第二，即使已了解个别教师写的一些情况，也不宜在揭批“某顾问”和聂元梓的会上一块端。康生的专案组，何时成立？党委当时不得而知；新华社《内部参考》登载康生如何策划大字报，也是1979年以后的事；1980年10月以后，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才逐级下发、传达；人民日报报道“党中央决定开除康生党籍，向全党公布康生反革命罪行”已是1980年11月了，离北大揭批康生、聂元梓大会已过了将近两年。这时，有关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的材料比北大原来掌握得丰富多了。我们2001年文章中所引证的材料都是从头了解、调查的，许多是过去不知道的。如果说我们的文章与校刊20多年前登的内容有些不同，那是因为情况多了自然就有所深入、有所“调整”，这有什么奇怪？

## 二、对两个材料的解读和分析

1. 对“康生自白”的解读。我们文章说：1967年1月22日和29日，康生在两个场合作了进一步的自白。他说，1966年5月他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北大，“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这张大字报的矛头是针对彭真和北京市委的”。印文说：康生“没有用‘发动’，而是‘促动’即促进和推动。”可是“促动”为什么只能解读为“促进和推动”呢？“促”也可解释为“催促”、“督促”，“动”也可解释为“发动”、“动员”，“促动”，解读为“督促和发动”有何不可呢？“文革”中和“文革”后，一般都认为康生的话是对他炮制大字报的“自白”和“不打自招”，就是从“督促和发动”意义上理解的。印文为了适应他的观点将“促动”“解读”为“促进和推动”。但印先生所谓的“推动支持”是有条件的，印先生在其“三步曲”中明确讲：是在“哲学系少数教师发起”后，康生和曹轶欧才“给予了推动和支持”。从康生的“自白”中能看出这种“事后推动”、“事后支持”的意思吗？

2. 印文说：在“五一六通知”前曹轶欧在北大找聂谈话，曹对聂说：“你们就这样算完了？让人家整了一通，放下去搞四清，说走就走，学校的事情不管了？”聂元梓“对曹轶欧的意见态度冷淡没有响应，随后去为参加四清作安排”。印文说：“曹轶欧对聂元梓这次谈话没有产生结果。”首先，聂元梓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曹轶欧等人住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有一天，曹轶欧找我谈话，她动员我不要下乡去，要我留在学校里，继续与陆平他们斗争”。印先生把这段话重要的话删掉了。

聂元梓还说：“陆平要把我发落到乡下”。“我过几天就要到怀柔去了”。

聂元梓真的是对曹轶欧的“动员”、挑动，那么消极吗？不。

印文说：“要为北大社教翻案是前社教‘积极分子’的共同愿望”。而聂元梓是北大社教的“大左派”，对社教耿耿于怀，时刻想翻案，怎么在曹轶欧“动员她继续和陆平斗争”、翻社教的案时，她却“消极”起来了。这时即使“五一六通知”尚未传达，《北京日报》和“三家村”早已被公开批判了，身为社教大积极分子的聂元梓怎么倒“消极”了。

聂元梓从曹处回来后，并没有到农村参加四清，她到农村去“看了一下”就回来了，她把

白副处长约到她宿舍谈话，要白给她准备材料，她要向中央写信“揭发陆平”。聂元梓在2003年回忆中说：“这是康生插手北大的险恶手段，他知道北大存在严重矛盾，就像苍蝇一样，也要叮北大这个‘有缝的鸡蛋’了。”

曹轶欧找聂元梓谈话时间，聂说是在北大专家招待所。据刘仰峤讲，他和曹5月14日到北大，在专家招待所只“住过一个晚上”，以后就“住在西颐宾馆”，这样曹找聂谈话当在5月14日。又据陈守一谈，曹轶欧第二次找他谈话是5月15日左右，在西颐宾馆，曹轶欧动员他：“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你可以和聂元梓等人共同来搞。”如果聂元梓真如印文所说的那样“心灰意冷”，对曹“态度冷淡”，曹轶欧能提出让陈“领头和聂元梓共同来搞”吗？而聂元梓找白处长谈话，要准备材料上告陆平，能说曹轶欧和聂的谈话“没有结果”“没有响应”吗？

### 三、大字报是怎么提起的，谁先提出的？

曹轶欧调查组进北大时，中心任务是揭发陆平党委和北京市委，“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揭发的方式，也没有具体规定，所以曹轶欧谈过话的人，有的给中央写报告，有的在常委会上盛气凌人、无限上纲地揭批陆平。调查组除张恩慈重点在北大活动外，每天派二三人到市委摘抄内部大字报，“回来后抄写清楚交给曹轶欧，曹说是为了给康生看的”（调查组成员的话）。康生对调查组摘抄的大字报很重视，曾予以表扬。这在调查组里是都知道的。张恩慈重视大字报不是无根据的。聂元梓、杨克明等开始都只是想写材料上报中央，后来改为写大字报，这中间与康生和调查组对大字报方式的肯定有直接关系。

1978年12月杨克明写给党组织的材料说：“我（自科学院）回到北大与赵、高交谈，他们告诉我聂元梓想写材料上告，后来我到马列研究院找张恩慈说，我们也要向中央反映才好。张说：现在中央通知已下达，向上反映情况的材料还少得了？上边哪里看得过来那么多。他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里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了，还是这样来得快。我当时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要求他和我们几个人一起来搞，他说他已被抽调参加到北大的一个调查组，参加北大的事不方便，你们几个人搞就行了”。“回到北大，我找了赵、高，谈了张恩慈的想法，他们也表示赞成，并说宋在，可找他一起搞。宋来后也赞成写大字报。”杨克明1978年6月写的材料中还讲：我找张恩慈，“是想让张恩慈来参加领头的，张说现在是公开批三家村，‘五一六通知’也传达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材料还少得了？意思不大。他说北京市委机关有贴大字报的。……”“张恩慈的话对我确实起了启发作用，又可说是暗示作用。我和赵、高都认为张的话有道理，写上告材料不如干脆写大字报，从现实问题抓起”。赵1978年后写的两次材料讲：“串联开会写大字报的是杨克明”。“我是杨克明串联的，我又约了宋，晚上到杨克明宿舍，参加的还有高、夏，聂元梓是后来的。大家商量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有人说：张恩慈说可以写大字报，后来就决定写大字报。”1980年6月11日，从四清被调查组调回来的一位党员讲“……我又听杨克明说，他们开始时打算写材料通过曹轶欧向上面反映北大问题，因为形势发展很快，张恩慈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写大字报，于是他们便改为写大字报”。1978年12月，张恩慈讲：他（杨克明）说：“写完大字报后要我给看一看，我怕担嫌疑，我说我不看了”。

印先生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说：“张恩慈对杨克明提到大字报的形式，默认宋一秀和高云鹏写大字报的想法，对杨克明等人后来转向运用大字报而不是申诉信的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杨克明正是在与张恩慈面谈以后，找了其他几位教师，讨论写大字报。”印先生这段话实际上已否定了“自发论”，但他却仍转弯抹角地坚持“自发论”。

### 四、奇特的“解读”

1. 1979年，北大人处白副处长给党委写的材料中讲：他第二天又到西颐宾馆见张恩慈时，“张恩慈告诉我：他正在组织人写大字报，贴出来之后，要我从一总支角度上支持一下（人事处党支部当时属机关一总支——笔者注），这时我才知道他正在组织写这张大字报。”

调查组副组长刘仰峤在1979年7月16日讲：“大字报出来后，张恩慈同志告诉我：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由他出面和杨克明商量后杨克明写的。”他的结论是：“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串联是张恩慈，执笔是杨克明，聂元梓搞成第一名是因为聂是总支书记。”

以上这两位干部写的证明，是被印先生认为“真正有些分量的”材料，两人都是直接听张恩慈讲的。印先生对这两个重要材料的解读是：“张恩慈坚决否认”、“刘、白二人都已经过世”，因而“不能再核实”，“十分遗憾”。至此而已！

刘仰峤是调查组的副组长，高教部副部长，原北大社教工作队的副队长，白副处长曾任北大校文革副主任，与张恩慈都是社教中的大“左派”，是无话不谈的“战友”。印先生是善于思考、怀疑的，难道这两位干部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听到同一人同样内容的讲话，就能够因一人否认而否定吗？两人已故，档案犹存，岂能以“遗憾”了结。

2. 还有1967年大字报主要作者写给戚本禹、江青的信中，有该作者写的《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的专题报告，这也是印文认为“有些分量的资料”。报告内称：“哲学系左派联系的中心是张恩慈，在他那里保存了必要的资料，随时准备斗争。”“孔繁同志有时回城，到张恩慈处谈过。”“在二——五月整个时期内，杨克明和张恩慈保持了经常的联系，留校的同志也和张恩慈有过联系”……“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同志带领了调查组来到北大！张恩慈也跟著曹大姐来了，这对我们是特大喜讯。”“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做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这是中央文革对北大革命派的最大支持和正确领导，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对于大字报主要作者在信中的明确表述，印先生作了奇特的解读，他说：1967年当时“大字报的署名分属两派，双方为写大字报之事争功，竞相攀附‘无产阶级司令部’做政治靠山。为派性利益而写的文字往往有或夸大其词或隐瞒真相的失真之处。”把大字报主要作者的这封信，说成“为派性利益”“争功”“攀附”，如果这也是印先生的“解读”，那不但是对事实的严重曲解，而且是对写信人的极不礼貌、极不尊重的表现。

印先生说他在王效挺处看材料时，杨克明给江青信附的“报告”中还有一句讲“支持”的话，而且说，信中又讲“指示”，又讲“支持”，他质问道：那么那份“报告”到底算是“指使说”的证据，还是“推动支持说”的证据呢？这次我把“少引”的一句话引出了，即上段引文中最后的一句：“这是中央文革对北大革命派的最大支持和正确领导，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这里讲的“支持”就是指的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的“指示”，和印先生三步曲中所说的“事后支持”是两码事，怎么能作为“推动支持说”的证据呢？

印先生又说了：“1967年那份报告中所说的‘指示’似仅指大字报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大字报最重要的是内容，如果内容是自己决定的，而非授意的，那么指使之说就成了问题。”

3. 大字报内容问题：印先生已不得已承认了“写大字报”这种形式是康、曹通过张恩慈“指示”的，这就进一步否定了“自发论”。然而却提出了大字报内容问题。可是具体内容还需要具体指示吗？譬如曹轶欧曾恶狠狠地指示北大党委某常委：“揭陆平的盖子”，“要连锅端”。该常委给中央写了“揭发”材料，更激昂慷慨、火力很足地对陆平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如果该常委说：我写的揭发报告内容没有给曹轶欧看过，我批判陆平的发言内容也没有报批过，曹



轶欧并没有指使我如何揭盖子、如何连锅端，因而我的行为不能算受曹的指示。如果他要这样回答，谁都会感到这是十分荒唐的。但该常委毫不含糊地承认了曹的指示。聂元梓在1979年7月一次交代中说：“‘五一六’通知发出前，我和曹（轶欧）谈学校问题”，“我只想再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个报告。”后来“曹轶欧说可以写大字报”，大字报“具体写什么内容，曹也没有指示。学校有什么问题，曹心中有数。我们回到学校就吹风，酝酿写大字报”。2003年聂元梓在回忆中说：“曹轶欧说：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以及给陆平提意见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还有调查小组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我们“反正是对著校党委和陆平工作问题的”。

曹轶欧等人知道：他们所谈话、发动的对象是北京大学的干部和教师，不是幼儿园、小学生，不用把着手教他们怎么说、怎么写。他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揭发陆平、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揭什么，他们“心中有数”，心照不宣，或不言自明。因此，以曹轶欧等没有指示具体内容来否定康、曹的指使，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话又说回来了，他们对大字报内容也不是没有引导的。据刘仰峤1979年7月讲：“一次张恩慈同志提到宋硕同志谈有关开展大批判的精神（按：即5月14日陆平传达宋硕讲话）就认为抓到东西了，她（曹轶欧）说这就是要捂盖子。要从学校往上搞。从此开始，一直到聂元梓等第一张大字报贴出，都围绕宋的讲话进行调查。”前边引的1978年6月杨克明写的材料中说：“我找张恩慈，张说：现在是公开批三家村，五一六通知传达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材料还会少？意思不大。他还说及现在北京旧市委机关有贴大字报的。……回到北大我又与赵正义、高云鹏一起，讲到张恩慈的想法，我们三人都认为张的话有道理，写上告材料不如干脆写大字报，从现实问题抓起。”

再如，印先生讲到宋、高和张恩慈的谈话：“张恩慈介绍说，调查组到北大是为了调查学术批判情况。他说，北大的运动有点死气沉沉，法律系组织师生整理古代平冤狱的历史资料，埋头故纸堆，方向不对。谈到如何打开局面，张恩慈提议串联左派。”

这不都是引导大字报作者要抓现实问题吗？而且“第一张大字报”内容就攻击法律系调查海瑞平冤狱是“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印先生编出一个“种瓜得豆”的说法，说张恩慈与杨克明只谈了社教问题，没谈现实问题。实际上张恩慈在5月5号已向毛主席写了对北大社教的意见，5月13号，中央已批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所以，张恩慈说再写社教材料“意思不大”，“启发”他们写大字报“从现实问题抓起”。这里没有什么“种瓜得豆”，而是种了豆印先生视而不见，或假装看不见。

这里顺便说一下：印先生讲到张恩慈这次谈话时，说是“宋、高主动去找张恩慈谈话”，而不是张主动去找宋、高。并想以此证明张恩慈很“谨慎”，没有主动在哲学系搞活动。事实恰恰相反。请看1978年12月12日宋写的情况：“五月二十一日（？）晚在一院十七号（注：北大一院是调查组成员住处之一），张恩慈找了赵高和我。他说中央理论调查组来北大了解文化革命的情况……”高1981年8月写的情况是：“大约5月20日，张恩慈找赵宋和我到一院一楼谈话。”二人所讲一样，是张恩慈找他们三人去的，不是他们自己找去的。而且宋还讲：“我先后写过文字材料（还保留有底稿），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写的材料基本事实都是一致的。”我相信宋、高的说法，不会经过印先生一“访谈”，说法就变了。

## 五、张恩慈的“功劳”不可低估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的讲师，1965年7月由康生点名调出去的，有关部门到北大党

委和哲学系了解情况后，就通过高等教育部于7月7日正式来调函：调张恩慈去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7月份张即到院报到。不是有人所说的张是北大社教后因为不满自己要求调离北大的。张恩慈是康生、曹轶欧充分信任的，在调查组是被称为“曹轶欧的助手”。曹轶欧找陈守一、白处长等人谈话，张恩慈都参加的。调查组除两位组长，一位保管文件值班外，其他三人经常到市委大楼摘抄大字报。只有张恩慈一人重点在北大活动。再看一下和曹轶欧、张恩慈关系密切的某常委在文革初期讲的一段话：“曹轶欧原来准备一个一个串联社教积极分子来发动群众，但太慢了，就决定写大字报，具体是由张恩慈负责的。”从以上所引材料，特别是刘仰峤、杨克明、白处长、孔等写给各级各单位党组织的材料，都可证明张恩慈在北大这一段所起的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引一段聂元梓在2003年写的一个回忆：“1966年的8月份，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指示要北大的革命师生列席会议，我和杨克明、张恩慈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三个人。康生、曹轶欧参加了接见。毛主席……表扬我们的大字报写得好。”这次接见生动地反映了大字报出笼的重要人物的场面：康生、曹轶欧是策划、指使者，张恩慈是串联者，杨克明是主要执笔者，聂元梓是领衔人。和刘仰峤说的十分吻合。

如果像有人所说：“张恩慈事先不知道他们写、贴大字报的举动”，或者像印先生所说：“是几个教员提出、曹轶欧表示认可”，张恩慈只是“谨慎”支持、有所回避，甚至也没有“主动去找”哲学系教师，“大字报贴出来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康生提名要毛主席接见之人中有张恩慈岂不荒唐？在当时接受毛泽东主席接见是最高的荣誉，张恩慈如果在大字报问题上无大作为，享受最高荣誉，岂不是贪功受奖吗？这中间的奥秘不值得深思吗？印先生对杨克明1967年的信，可以怀疑是“为派性利益”“争功”，甚至怀疑有“隐瞒真相”之处。那么有人在诸多证据面前拒绝承认，印先生就不怀疑，个别人为了摆脱与康、曹的关系而“隐瞒真相”吗？对有利于印先生“自发论”的说法是一种“解读”，对不利于“自发论”的证据，是另一种“解读”，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

顺便说一下印文所讲张恩慈的“谨慎”，我们认为这是用词不当。曹轶欧到北大，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表面说：不干预党委工作，暗地里却到处找人煽动他们“揭陆平的盖子”，“与陆平斗争”，“连锅端”……真正的“谨慎”应是言行一致，防止自己的行为干扰了北大党委的工作，而曹轶欧找人谈话煽动后，要人“严格保密”、“绝对保密”，这是搞阴谋，不是什么“谨慎”。曹轶欧嘱咐张恩慈：“支持哲学系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了，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因为他们曾宣称只作调查不干预北大党委的工作。因此和一些人接触，如果不注意，被陆平觉察会造成被动。”就是说怕露马脚，怕阴谋暴露，怕“造成被动”，亦即张恩慈说的“怕担嫌疑”。这算什么“谨慎”？芽这是不干预党委工作吗？这段话是张恩慈和他最亲密的战友讲的，他的战友正式向党组织写的材料，否认不了吧？

## 六、回答印先生几个具体问题

这些具体问题，与大字报怎么出笼没有关系，是印先生断章摘句、节外生枝，必须回答。

### 1. 关于“学术问题”，和“文革思维模式”

印先生说，我们讨论的是“学术问题”，应“尊重学术自由、学者尊严”。我们赞成不管讨论什么问题，都应该尊重对方、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断章摘句、曲解原意，不要强词夺理、节外生枝。我们讨论的是名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第三名骨干成员、罪大恶极的康生的一条罪行，这是个政治性很强的问题。我们前文认为印先生在根据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否定康生的一项罪行，会“起到混淆是非，为康生、曹轶欧开脱罪责的不良影响”。不是吗？有文章称道你的“自发论”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说过去的结论是“道听途说”、“主观臆测”、

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这还不是“不良影响”吗？“不良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印先生主观意图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也没有去猜测。而印先生摘了我们半句话：“为康生、曹轶欧开脱罪责”，这就曲解了原意，把客观影响变成了“主观意图”。这样断章摘句、摘半句的做法合适吗？印先生不会分不出客观影响和主观意图的区别，为什么要这样曲解呢？无非是想给我们加上一个“文革思维模式”（即印文所说过去时代所盛行的“语言和思维模式”）。但这是徒劳的。提起“文革语言和思维模式”，我们想多说几句。文革语言和思维模式可以举出许多，譬如：“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造反有理”、“打人越凶越革命”……还有什么，“红五类”、“黑七类”“臭老九”等等谬论。但最主要的是两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谬论在文革中泛滥成灾，搞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对于这些乌七八糟的文革语言，人们是深恶痛绝的。一般说来，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帮”、“走资派”等等的批斗对象，是要比造反派或其他派感受更深一些。

## 2. 关于“权威结论”和“政治审查的资料”

印先生说：“北文（指我们的文章）坚持20年前权威的结论，主要依据70年代政治审查的资料”。不错，我们是主要依据中央专案组审查康生时的资料，而印先生主要依据什么资料呢？依据20年后个人对一些当事人的访谈。给人的印象是：印先生对个人的访谈十分相信，对康生专案审查期间的资料却从各个方面提出怀疑。这里需说明：不能笼统提“政治审查的资料”。当时中央立案审查的是康生、曹轶欧，北大党委配合北京市委立案审查的（有关大字报的）就是聂元梓一人，大字报的其他署名人及有关人都没有立案审查，他们写的材料或称揭发材料，或称汇报，都不能说是“政治审查的资料”。我们也从未称过是“交代”材料。譬如，我们文中说：“杨克明写的材料”、“杨克明写的情况……”而印文中引用我们文章时，却把“材料”和“情况”，都改为“交代”，这样做合适吗？为什么要强加于人呢？

还有，我们在文章中掌握一条，尽量少提名，只有在不提名不能说明问题时，才提了几个人的名。这是考虑许多人都是老年人了，他们需要平静的晚年生活，尽量不使这些陈年老账去干扰他们。但是，印先生年轻力壮，考虑不到这些，到王效挺处看材料时，材料上都有署名，印先生把我们不肯提名的一些老同志、老干部（包括已谢世的，但老伴还在），都把名字提上了。这样做也不好吧！

## 3. 所谓“稍加编辑多次发表”的问题

笔者文章只有一个稿子，即在《北京大学校友通讯》上发表的。《校友通讯》是校友们交流思想、信息的内部刊物，每半年出一次。印先生文章发表后，许多校友来电话要求北大撰文澄清事实，所以我们把文章首先送校友通讯以示答复并听取意见。与此同时，我们把稿子正式送给曾刊登印、穆两先生文章的《百年潮》和《中共党史资料》。这两家刊物都以高姿态、负责的态度先后登载此文，但都从不同角度有所压缩。校友通讯发出不久，即有一位不相识的老校友，打电话给王效挺说：他是1946年入北大（比王高一级）的校友，看到了我们的文章，他说了一些肯定、鼓励的话，然后提出：此文只在内部刊物上登载不够，他拟推荐给《炎黄春秋》。王对他的关心和鼓励表示感谢，但告诉他该文《百年潮》刊物已将主要内容登了，不用再给《炎黄春秋》了。过了一段时间，《北京日报》理论版根据校友通讯上的稿子摘登了三分之一。这是好几天之后，有同志告诉我们，才看到的，更说不上是笔者“稍加编辑……”北京市委是“第一张大字报”攻击诬陷的主要对象之一，《北京日报》摘登此文自有道理。至于上海《世纪》刊物，也是有校友推荐。因为上海原市委委员、教育卫生部长兼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曾是北大社教工作队的党委副书记，因抵制队党委书记、队长的错误做法，向总书记小平同志写信揭发，是个坚持党性原则被当地誉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但在文革初期，聂元梓带人到上海造反，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伙同上海造反派颠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常溪萍被打成“北大社教

的叛徒”、“暗藏的反革命黑帮”，被残酷迫害致死。常夫人被迫害折断7根肋骨，断骨将肺上戳了6个洞，终身致残。上海刊物登载此文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登载时，是把《百年潮》删掉的部分（如“第一张大字报”的恶劣影响及中央组织部、北京市委为北大党委、市委大学部和宋硕、陆平、彭佩云及全国各地受第一张大字报诬陷的同志平反的通知摘录。）予以刊登。并对其他部分作了摘编。所以这些公开刊物上的压缩和摘编，都是编辑部职权范围内的事，无一不是笔者“稍加编辑”发出去的。印先生列举这些不知何意。可以告诉印先生，你还未列全，《报刊文摘》还摘登了1800字左右，这更不是笔者所编了。我们没有精力更无兴趣去了解哪些刊物摘登了印先生的文章。因为这与主题无关。

#### 4. 所谓“署名”问题

这更是与大字报怎么出笼毫无关系的问题。

我们不愿署本名，只愿用笔名，这自有我们的考虑。只有在《世纪》刊物摘登时，编辑部提出：他们杂志都用真名并注上职务，建议我们考虑。为尊重编辑部的意见，才改署本名。关于职务，我们说我们都早已离休，可写北大离休干部，若写职务只能是原来职务，请编辑部酌定。

建议印先生：有关“大字报”出笼的事，你尽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与“大字报”出笼毫无关系的事，没有必要节外生枝而浪费笔墨。

□ 《文史精华》2005. 12

~~~~~

【历史一页】

东湖风云录（之十一）

• 徐海亮 •

四、陶铸的陨落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武汉造反群众一再要求陶铸接见，要求陶表态支持揪斗王任重，他们并不十分清楚——陶铸自己正站在政治悬崖边缘。

12月27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批评王任重，后转而批判陶铸，中央文革成员猛烈攻击陶是“最大的保皇派”。在此之前，陶铸写报告给毛主席，建议王任重辞去文革副组长，回中南局工作，首先应该让他治病。毛泽东批复：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权文说27日的会本来是批王的会。12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出面保护了陶铸，说江青随便批判政治局常委陶铸，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毛将陶铸留下单独谈话，问他“早就透了话给你，一个多月了，你为什么还不去？”并让他赶快下去，代表中央到各地去保护一批领导干部。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宣布：“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当晚，深知内情的林彪召见陶铸，询问他情况，依然是叫他“现在就（要）被动……要被动被动再被动”。但一切已经晚了。

王力回忆说：“1966年底，毛主席认为中南问题相当严重。因为主要是陶铸管中南，

这时陶铸问题在党内核心中已经公开，群众中还没有宣布……王任重出问题比陶铸早，王任重早就回去了，毛主席认为王任重是不行了，但对这个人毛主席心里没有抹掉。……1966年底陶铸、王任重还是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没说他们就是走资派或特别坏。中南是在他们指挥下搞的，因此毛主席看来中南局面相当严重，特别是武汉抓人太多，打反革命太多，谁保省委就是好，谁反对省委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历史过程是：继工交会议后，中央又在12月召开政治局生活会专门批评陶铸。按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言，康生曾经面见陶铸，给他“路线交底”——“不要保王任重了，你保不住。别人也不要管那么多，你还是保自己吧……”看来，康生已经清楚陶铸下面是要挨批了；不过陶铸不愿退让，只说出“咎由自取”。毛泽东罕见地在26日生日宴请中央文革成员，祝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同日晚上，林彪曾要叶群电告陶铸：“要被动……你从现在起，要被动被动再被动”。林彪心里自然有数了。2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生活会）批判陶铸，按权文所说，此会似乎是政治局与文革小组的联席会议，是为了贯彻毛泽东批示的给王任重提提意见。这里，从当天陶铸回家与曾志所谈情况程度，曾的理解和回忆，权的阐发，都可能与历史有一些重要出入，回避了正是毛要批判陶铸。陶铸早前的确给毛泽东有报告，建议王辞去文革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最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毛泽东专门有批示：王离开北京是11月初，当时可能没有来得及开会提意见。但12月25日他从广州被揪回武汉，并不在北京，27日的会他并不在场。可见此会不完全是专门批王的会。所以，权文说“然而，文革小组向王任重提过一些意见后，陶铸便放下一些心。不象想象得那么严重”，“就在陶铸稍稍松口气之际，会场气氛陡转。矛头突然转向陶铸，猛烈开火了”。文革成员全部出马，批判陶“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陶表示愿离开岗位到下面去参加运动。

王力说工交会议陶铸做了检讨，“这个会后陶铸的地位变了，工作还照旧，没有改变。这时主席定了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历史学家不知道这个会。这个会在怀仁堂，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个会明明白白地说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直批评陶铸，主要发言是陈伯达。主席定了要开这个会，大家议论是要陈伯达发言”。并且王力说该会议无记录，陈伯达的讲话与67年元月的大致一样。

关键是在27日开此批判会的前夜，毛泽东在自己家里宴请文革小组成员，对开展文革运动的意义和下面做法进行重要交底，也谈到“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要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请注意，毛泽东所引咎由自取就出自陶铸坚持自我的话。前后对照，毛泽东和陶铸的决心都是确定不移的。

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有数处谈到陶铸的倒台，可作旁证：“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后，（周）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再加上…王力在私下已经向周打了招呼，告之以毛对陶铸的种种不满……很显然，工交座谈会触怒了毛，陶铸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会后，他（周）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送给毛看，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援之以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

武汉群众加大了革命造反的步伐。1967年1月1日、2、4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判斗争王任重，并给他戴了高帽子，张体学、赵修（已经改名“立公”，令人想起法国革命时的菲立普·平等）等省市领导被带来参加陪斗。会场上的巨幅标语是

“枪打出头鸟，油炸九头鸟”！

患着严重肝炎的王任重脸色发青，耷拉着头；1966年冬天奇寒，那几天飘着大雪，省委领导在主席台上都穿着军棉大衣，也冻的禁不住淌着鼻涕。会议组织人只有让他们轮流在台上示众，轮流到后面小房间暖和一下。又为防止在场走动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抢走王任重，主导会议组织联络的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让一名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生，假扮王任重，穿同样衣物，坐同样汽车先走，摆开迷魂阵；王本人则闷在车里，在武汉三镇兜好大圈子，回到住地，已是精疲力竭。事情马上就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总理要求保护王的健康和安全，并亲自指示南下造反大队和武汉群众把王就留在本地批判，南下同学遂与总理办公室建立正常联系，不断汇报武汉运动动态；进而联系组织了总理对武汉批王联合指挥部的接见（1月29日凌晨），是周恩来首次专门接见武汉造反派，那是后话了。

批斗王任重，激发了武汉批斗犯所谓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热潮。一时，各级干部站在汽车上被带向三镇游斗。被斗者头戴高帽，帽子花色也颇多，最别出心裁的，传承传统文化——如旧戏中县官戴的官帽，两根弹簧还一跳一跳，游街和侮辱人格成风，极不严肃。被斗的人多了也痞了，有的人也满不在乎，还四下眺望，以至自己好笑……

对于此，王力也有回忆：“王任重回去时没有思想准备，认为局面可以维持，可是一回去就不行了。特别是陶铸问题爆发，王任重就顶不住了，戴了高帽子游街，香港报上登了。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叫我起草个指示，戴高帽子游街绝对禁止登报。不应该这样作。把王任重围斗十天，王任重肝不好，对他残酷斗争不对。王任重确是比较优秀，能动脑子，爱读书，会写文章。毛主席对人都是两面的，不执行他的路线他不能容忍，特别是在重要的岗位上不能容忍，另方面他对人还是比较宽的，我快打倒时王任重给我写了个条子，我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叹口气说：‘王任重到底有多大的罪呀？’毛主席看来，王任重并没有被抹掉，只要改正错误站到他的路线上来还是可以用的”。

群众组织发展壮大，与领导干部的互动迅速深化。这种特殊的政治交流是当代中国空前绝后的。原汉阳三中谢保安回忆：“我就是这样很自然地成为头头，拥戴我的也都是那些‘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就是在运动初期对运动方向和现实的不满的多，势力逐步壮大，最后整个三中没有第二派。后来封闭‘湖北日报’的事情，我也参加了，凡是对现存当权派体制的冲击我们都参加。开始都是局部和零星的组织，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红反团，主要是中学生的组织。我们找到市委，要办公地点、资金、纸张等东西，也是孙德华（原工作组组长）当联络员，市委辛甫批了2千元钱给我们。在武汉全市性批斗走资派的高潮中，辛甫、宋侃夫和邓垦都曾经在我们学校呆过半个多月。我跟他们接触比较多，他们也给我讲了一些事情。虽然当时认为他们是走资派，但是还是把他们作为老革命看待，非常尊敬，而且我个人对老干部也有感情。在吃住上面，也惟恐没有照顾好他们，晚上就给他们三床棉被惟恐把他们冻着，因为当时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非常关照，辛甫说呆在三中不想走，我跟他开玩笑说，现在开批判会要打倒辛甫，他也跟着喊打倒辛甫”。

“最有印象的是邓垦，他说自己与邓小平不是真正的亲兄弟，至少是不同母，在年齿上也很悬殊，小时候因为邓小平出洋读书，感到他是见过大世面的，很崇拜他。他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是李富春，跟蔡畅大姐的关系，也远远比嫂子卓琳亲近。他自己不是刘邓线上的人，在西南地区是反对李井泉（按：当时西南局、四川省第一书记）搞瞎指挥和浮夸风的先锋，因此被打成右倾，（按：邓垦与重庆市的“萧李廖集团”同时，在1963年划为右倾）……为了走出李井泉的阴影，就求李富春把他调出西南局的地盘。他说自己跟小平完全是两码子事，把他说是邓小平安插的钉子，是天大的冤枉，他自己也要打倒邓。他当时是武汉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从他说的情况看，比较入情入理，可能并不是为了洗脱自己的编造。那个时候，在批判王任重

的时候，在王任重家里找到许多‘四旧’证据，于颜面上很不好看。一天邓垦对我说，小谢，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我家里也有些‘四旧’，应带头破掉，要我帮忙找他的夫人递条子，要他的夫人按照条子开列的项目，把一些东西主动清理掉。后来他跟我的叔父谢威说，你的侄子是真正的革命小将”。

“另外还有一个人在我们那里的是市委书记宋侃夫，他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沉重，他是四方面军的人。他说别的红军长征一次，他们是来回折腾几次，雪山爬过去了又爬回来，再爬过去。在延安的时候，就像是孤儿一样，遭到别的山头的歧视和白眼，延安审干运动破除山头习气，强调纪律和团结，对历史问题和责任做出结论，他是衷心拥护的，深切地感到毛主席带来的温暖。这些人因为跟造反派深入接触过，从来就不把造反派看作洪水猛兽，对造反派反而有感情。我们也没有要他们坐飞机，更没有罚跪，在出席批斗会的时候，给他挂上牌子还说对不起，下来就赶紧去掉”。

看来，在非常状态的交往中，领导和群众实现了相互的沟通，也开始相互理解。湖北省委的领导干部由高校学生组织学习和批判，双方在思想、文化方面更有熟悉。王任重身患肝病，水院负责监管和保卫他的学生余某，还专门为他煲药，倒痰盂；后来在清查造反派虐待领导干部罪行时，专案人员去王处询问，王说不要查了，余某某当时是“保护了我的”。专案人员追查一位造反司令方保林的问题，王任重对他们说“不要再追学生的问题了，他们也是受骗的”。而省委的几个秘书长、部长、常委，思想包袱少些，他们在造反派的学习班最先承认错误，开始揭发王在运动中的不是，象刘真、张华，受批判最早，与造反派接触最多，也就最先表态支持群众了，后来，张体学省长思想也开始解放，主动参与揭发批判。

在批判王任重高潮里，学生在省委造反派协作下，抄了王的家，拿出一些“四旧”，办了王反党反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展览。王收藏的《资治通鉴》、中学毕业文凭、与家人在东湖游泳的照片成为罪证。但也有理智的造反大学生私下表示不同意见：古书就是“四旧”吗？旧毕业证上有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就算是“梦想蒋复辟”吗？在东湖穿泳衣留影，大家也不一样吗，何谓“生活糜烂”呢？说毛主席“何须衣锦还乡”就是反毛吗？王任重这些行径最多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秀才迂腐情调甚浓，与革命领导形象有差距吧？以此划为走资派是否证据不足？

看来，造反派并无后来渲染的“残酷阶级报复”，没有把王往死里打，大概连对立派的同志也真有感觉，到1967年春夏，他们造出大量舆论，说“工人总部保王任重”，造反派的某声明“经王修改过”；此外，传说王任重与张体学对军区压制群众有看法，王还写材料批评、揭发陈再道。舆论十分迷人、乱真，弄得省军区独立师（8201）领导居然认真布置追查有王“修改字迹”的手稿；7月18日，武汉空后的政委居然面对周恩来认真报告“（走资派）王任重支持工总”，所以工总是反革命，不能平反！周几乎哑然失笑：“我感到惊讶”！

当然，王任重对群众无限上纲的批斗并不服气，特别对省委干部起来揭发批判自己，更感寒心。次年春他给陈再道写信，就谈到这些问题：“自从去年12月25日回到武汉之后，我就失去了行动自由，一直在革命造反派的监督和管理之下生活。从一开始革命群众就把我当作敌人对待，给我加了许多大帽子。原来省直机关的干部大多数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自从1月20日前后开始发生了变化，省直机关的造反派也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了。那些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被称作‘保皇派’，有的被戴高帽子游街，受到很大的压力，于是‘一边倒’的情况出现了。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为我说一句公道话”。

“原来省委常委和部委厅局的干部绝大部分还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舆论压力之下为了和我划清界限，也起来把我当作敌人对待，省委一批领导同志（以张华为最活跃）开

了我一次斗争会，对我和张体学，王树成三人也是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罚站，低头。他们喊的口号是‘打倒湖北黑省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张体学’等等。我对他们这样做法觉得很难理解，难道他们真的不了解湖北省委的情况？真的不了解我和张体学的情况？对于革命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同时由于对我们所犯的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很气愤，他们认识问题有片面性，有偏激情绪，是不能责备他们的。狠批狠斗，过火一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对于打掉我的官气和骄傲大有好处，对于促进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改造世界观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我对于群众不仅没有什么埋怨和对立情绪，我确实感激他们。不然我就不能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但是对于省委领导同志的这种态度我是有意见的。特别是像张体学这样的人，把错误推给别人，把功劳归于自己，不惜歪曲事实，以达到混关的目的。省直厅局长一级和部委一级也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起来以极左的姿态出现，到底是真革命真造反，还是个人出风头，或者是牺牲别人保护自己，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对“路线错误”已经承认和理解，对于造反群众还是比较宽容和理解，但对于省直领导干部造反，确有些较真的。一般公开批斗，王没有任何辩解与抵抗，但农历除夕晚上在水院开批斗大会，省委副秘书长吕乃强上台揭发，王忍无可忍，居然昂头大叫“撒谎”以斥之！

到1966年寒冬，公开打倒王任重，批判陶铸的舆论，由中央文革亲自来鼓动了。

1月3日中央文革接见北京大学代表，江青就说：“你们内部左派都应拆开，不能搞自由结合。王任重就主张自由结合，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宗派主义”。陈伯达接道：“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王任重的观点，要破这个东西”。……江青：“中央文革没有派，王任重到北大联系，王任重是作为北京市委的顾问，那些联络员，也是他自己派的，他实际上是包打天下。清华也是这样，他想拖我们犯错误，关于北大停止斗黑帮，搞选举，王任重没告诉我们”。陈伯达：“……但王任重这个人真是两面派，你（聂元梓）选，他说你争位置。王任重说你容不下人，我们是为了保护你，让王任重对你说应气量大一些，可是王任重对你只说好话，背地却对孔凡，杨克明说你的坏话”。江青说：“你们学校刘邓路线具体表现在孔凡，杨克明手上，王任重要两面派，可厉害了。王任重不是一般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而是要手法，耍两面派”。“自从张承先被赶走后，王任重包揽一切，我们不了解北大情况”。

王在1967年3月2日给陈再道等的信也谈到这些问题：“（1）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引起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愤恨。（2）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但是我不仅在‘十六条’以前犯了路线错误，又没有及时地作出深刻的检讨，工作会议之后，没有回武汉而是到广东休养去了。这样就引起了人们对我的怀疑，怀疑我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是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等。（3）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从关锋、戚本禹同志开始点我的名，后来江青同志几次点我的名，这样许多人（包括我的女儿王小平）就肯定我是一个大坏人了。人们不知道我在北京工作期间的具体情况，连江青同志也听到一些群众反映而点我的名。（如东城区、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老板问题）我已经向伯达、江青同志和主席、林彪同志写过三次信，说明情况，请中央调查核实。前几天我又专门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解释她批评我的一些主要事实……（4）我在过去的工作中，办过错事，说过错话，写过一些不好的有错误的文章。在揭发批判的时候，人们只抓错误的一面，或者只抓一句话、几句话、不讲全文，不讲当时的具体情况，把所有这些错误的东西罗列起来；甚至加以夸大，这样当然显得特别严重了。还有些人是有意歪曲事实；也有的人捏造事实，甚至栽赃诬陷（如蒋介石的照片）我不知道这些人故意这样搞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为了自己过关”。

王任重自己的信文，已经将我们以上所陈述的几个月情况，做了很客观如实的概括。

1月4日，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赴京人员，陈伯达指责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是中南问题的后台老板；12月30日对学生那个态度完全是错误的。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联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江青插话：独断专行）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打倒陶铸”标语立即贴遍京汉和全国。

陶铸在被公开点名后，还与林彪写信说来京后辜负了毛、林的信任，万万没有想到顷刻成为“罪人”。“林彪见到此信后，默默不语，叶群怕被钓鱼台发觉招来大祸，赶紧叫内勤偷偷将此信烧掉”。看来，连副统帅林彪也没有办法保自己信任的这位老部下了。

不过周恩来依然不同意这样搞，到7日他对批陶联络站的人还说：陶铸是中央常委，开大会批判陶铸不恰当，常委没有讨论。不过第二天，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又是另一个说法，“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甚至，毛泽东还说“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武汉各个学校、机关和工厂党委，在批判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的浩大声浪中，一一瘫痪，造反派在许多单位里实现夺权，运动的实际权力乃至业务权力，开始归造反派群众。在元月，有市民和工人在街头辩论曲直、甚至有夫妻辩论闹离婚，也虔诚地找来学生造反派评理、论断。武汉业已到了好似1927年湖南农运的“农会决定一切”的时候。1月3日至5日，极其不满的“革命职工联合会”部分基层组织工人数千，停工北上告状，围堵车站、机场，到省委造反，受到中南局和湖北省委的严厉批评；造反派红卫兵斥之为“保皇派”“资反路线”新反扑，并与造反的工人、干部组织一起，批判曾经“保省市委”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与“职工联合会”。5日，“工人总部”组织开始采取压制“联合会”的“革命行动”，自行决定拘留三千余人，“联合会”也密谋用暴力抗争。两派的分歧和斗争，已经十分激烈和白热化了。

在新形势下，群众组织的变动、组合也在进行。1月9日，工人总部领导改组。原发起者之一李洪荣回忆：“1月9日晚上，朱鸿霞召集各个分部的头头来开会，要正式改组工总。把我们用车子接到会议现场，经过我的提名，工总改选的结果是：朱鸿霞、胡厚民、周光杰、李洪荣、郭红兵、姜诗臣、胡崇元、侯良正、余光顺，合计九人”。

也是在9日，造反派接管《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权力。湖北报接管委员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人民日报总编辑部表示坚决支持。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人作家李向阳回忆：“造反派组织封闭湖北日报，邀请工总参加后来夺权，我受李洪荣派遣参加湖北日报夺权，我被推举为社长兼总编辑。当时还有湖北日报的工人参加，湖北日报被学生封了之后，大家认为应该恢复发行，传达党中央的声音。负责夺权的是新派的龙梅生，他是胶管厂工人，很文静的样子。我当总编辑实际上也是傀儡，因为自己不懂报纸是怎么出来的，都是武大、华工的学生在那里，用电传机排好版面，我签字印刷”。

或许由于武汉群众正忙于各单位夺权造反、批判王任重，陶铸被公开打倒时，尽管“北京

来电”传单撒遍三镇，但未马上引起太大反响；毕竟群众对中央的这些重大变化并不理解，而武汉人要面对的事情毕竟太多了。长沙的造反派，居然因为陶铸激昂的支持过群众，戴过他们的袖章，要马上拉下脸面来批判陶，还真有些不好意思。这也是中南地区的一个实情。

批判陶铸的零星文章在元月20日才开始见诸二司的小报。系统批判则是更后的事了。

从当年流传出来的毛泽东在元月8日的话是这样说的：“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第二天，毛泽东又对中央文革小组讲造反夺权，“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在故作诙谐抬高红卫兵的毛泽东说来，似乎陶铸是被红卫兵解决的；幼稚的造反派们也真以为陶铸、王任重是被群众自己打倒的。其实，“唯我独革”的群众是天真加激情，中共中央常委，怎么可能由普通民众去简单“解决”掉？何况，到1966年底，中南地区的造反群众，不论是河南还是广东，是湖北还是湖南，都还没有真正明白和准备去“解决”陶铸呢！不过，毛泽东就是要让群众起来“弄倒”陶铸，不需他亲自出面，不论你说是出于鼓动群众（今天人们说是“利用操纵群众”）、是锻炼民众，或纯粹是政治运作，他就是如此去做了。我们这里主要讲明历史实情有什么，不想做是非价值判断。

武汉造反派在1966年秋天，自发地或逐渐自觉地站到了毛泽东这边来，可以说，当时的武汉，只有他们距毛泽东的意图最近；按照8月25日陶铸的表态，似乎正是他们代表了当时认为的正确路线和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是当时代表运动本质的主流势力。他们与王任重的冲突（实质也包括陶铸），使他们成为抵制和“解决”陶铸的物质力量。

王力客观地反思了66年深秋的运动，所谓批判资反路线，“实际上已经不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而主要解决八九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以及各省市领导人的问题。毛主席认为他们在这两个月中对路线斗争是不明确的，不坚定的，不彻底的”。当时，造反派的是否合法，基于他们如何能体现党的领导？可是陶铸口头上早就讲过“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更何况毛泽东认为当时流行的各级领导自己去直接领导红卫兵，在各级党团领导下进行运动，“是官办的红卫兵，认为他们自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跟工作组一样，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现在谁反对我这个党委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普遍产生了毛主席认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产生了‘保守派’、‘保皇派’”。王力说周总理和陶铸力图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王任重也是如此，但“毛主席认为不能这样搞”。“毛主席认为要支持下面起来的组织”。陶铸不明白毛泽东不赞成搞书记处，……陶铸还认真去搞书记处，还要依靠大区，“他到中央后要王任重当大区书记……毛主席不想要大区，他要直接搞省”。“陶铸管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中组部，把王任重和张平化调来。八九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反映了毛主席不要旧的组织形式、旧的工作方法，但陶铸还是要旧的，毛主席不满意”。另外是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毛主席把相当大的注意力集中到工人农民问题上。毛主席的想法同当时中央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又不那么一致”。王力认为如坚持多数人意见和“16条”的原则，工厂农村不全面铺开，工人农民不串联，不搞跨行业组织，运动“后果不会那么大”，发展到失控地步。但毛泽东认为如果工厂农村不搞，“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会利用工人农民，利用原来的组织形式和系统来反对学生的造反组织”。

更何况毛泽东对文革改造原有社会与经济、政治体制有着十分理想化的意图，光有文化教育战线的革命远远不够，林彪在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就全面地表述了毛的意思。

武汉造反群众不论是炮轰省委，或是自己解放自己，或是将运动扩展到工厂农村，还是夺取各级党委和旧的组织形式对于运动的主导权力，客观上都与毛泽东在1966年8、9月以来要解决的问题，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毛泽东就是需要敢于武昌首义的革命者，就是需要敢于护国造反的蔡锷。他们首次成为毛泽东心目中认可的革命左派，他们成为陶铸、王任重垮台事件的直接胜利者。对于一个工业、文化的大都市，这是十分重要的事。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这时当然不是空洞的赞歌了。

（全书完）

说明：本文引用有关陶铸与王任重的一些讲话、当时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中南局、湖北省委和广东省委的一些会议、电话指示记录，均参考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资料（2005），并参考当年红卫兵印发的文字资料。

□ 《东湖风云录》 徐海亮编著 银河出版社，2005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